

# 中美日三角关系的不对称性与应对之策<sup>\*</sup>

肖 刚

**[内容提要]**战后以来,日本对外政策一直以美日同盟为基轴,美国也一直把日本视为自己在亚洲的最核心战略盟友,日美通过双边军事同盟机制完全捆绑在一起,在对华政策上基本保持一致,中国在日美关系中引入变量的想法是不现实的。换言之,通常意义上的三角外交在中美日三国之间不存在。即使可以用三角关系的概念来描述中美日关系,也只能算作是一种权力向美日严重倾斜,而中国处于被动地位的不对称三角关系。应对中美日三角关系的严重不对称性也不必寻求特别的手段,积极地顺应时势至为关键。鉴于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和非传统安全日益成为国际政治的核心问题等大趋势,中国完全没有必要以传统的思维把谋划中美日三角关系作为中国外交的战略性安排。

**[关键词]**国际关系 大国关系 中美日三角关系

**[作者简介]**肖刚,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教授、全国高校国际政治研究会常务理事,主要研究国际关系、东亚问题、日本外交等。

建立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是新时期中国外交总的价值目标。在这个总目标之下,中国外交已建立起自己的若干话语体系,即外交范围的全球性、外交结果的共赢性、外交方式的开放性、外交气质的包容性和外交特点的自主性等等。为此,中国完全有信心十分从容和超然地处理好众多的双边关系和多边关系,其中也包括各种层次的三角关系,使之协调平衡地发展。但有一个明显的例外,就是中美日“三角关系”尚处在操作十分困难的严重不对称状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以双边方式很好地处理了中日、中美关系,但以三角关系这一多边方式来运作中日美关系时,遇到很多难以跨越的障碍。日本坚持以美日同盟为核心的外交政策,在许多重大外交问题上均唯美国马首是瞻,因此,通常情况下的三角关系概念不适用于中美日关系。

## 中美日三角关系的不对称性

中美日三角关系的不对称性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美日强大的军事同盟与中国独立防务的不对称

性;美日不断提高声调,鼓噪以促使中国和平演变为目标的“西方自由民主价值观”对中国社会主义价值观形成意识形态压力;在东亚多边政治机制中,美日的强势存在与中国相对示弱存在形成实力对比的不平衡。

首先,中美日三国防务关系的不对称性是明摆着的。2008年度美国的军费总额为6231亿美元,<sup>1</sup>中国国防预算为4177.69亿元人民币(按照2007年底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约合572.29亿美元),<sup>2</sup>美国的军费是中国国防预算的10.9倍。日本2008年军费预算为414亿美元,<sup>3</sup>人均军费预算约为中国的8倍。美日两个军事大国结成军事同盟后,其总体军事实力大大强于中国,中国与美日之间防务关系上

<sup>\*</sup>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批准号:05BKS007)的阶段性成果。

<sup>1</sup> /The President's 2008 Budget" <http://www.whitehouse.gov/omb/budget/fy2008/defense.html>

<sup>2</sup> 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新闻发布会上,新闻发言人姜恩柱就军费问题答记者问时公布的数字, <http://military.people.com.cn/GB/6955357.html>

<sup>3</sup> /我が国の防衛と予算 - 平成20年度予算の概要", <http://www.mod.go.jp/j/library/archives/yosan/yosan.html>

的不对称性极为突出。由美日同盟切入可以看出,中美日三角关系实质上是超强的“美日”一边对严重弱于美日的中国一边的关系。因为日本一角几乎与美国一角重合,通常意义上的中日美三角关系并不存在。由于美日军事同盟关系的延续和加强,加上美国主导的其他双边排他性军事同盟关系,东亚地区多边安全机制形成对美、日倾斜的特点,中国在其中明显受到孤立。只有在排他的军事同盟结构演变为开放、包容的多边安全结构情况下,中国才有可能找到出路。美国民主党总统参选人奥巴马公开表示,如果当选美国总统,“就如强化北约一样,……我将努力铸造超越双边层次的更加有效的框架。只有建立能够使更多国家参与的基础结构(inclusive infrastructure),我们才能促进东亚国家的稳定与繁荣,帮助应对从菲律宾的恐怖主义网络到印度尼西亚禽流感的跨国威胁”。<sup>1</sup> 奥巴马似乎看到了在全球性问题日益成为首当其冲的安全威胁与美日同盟之间的不和谐关系,他希望自己如有机会入主白宫,将在东亚建立一个开放的多边安全制度,但是他肯定忽略了日本在此问题上的强烈抵制将会给他的决策造成多大的障碍并最后葬送他的美好愿望。因为长期以来,日本视“美日同盟”为其国际战略的最大财富,要想轻易地改变之将是天方夜谭。即是说,短期内要想改变美日盟友关系及由此而来的中国与美日之间防务上的不对称性是非常困难的。

其次,美日坚持挥舞人权和价值观外交大棒,中美日三角关系中存在着外交上的不对称性,中国必须承受美日施加的人权、价值观外交压力。美国一直没有放弃对华单边“人权外交”。近几年来,日本也跟着凑热闹,神气活现地张罗针对中国的所谓“价值观外交”,即所谓“高举自由、民主、人权、法律之支配的普遍价值,以团结共有这些价值观的国家和人们为目的的外交”。美、日以“民主自由国家”自居,在中国早已将放弃意识形态的对抗作为对外政策基本内容的情况下,对中国大打价值观牌。中国基于“和平发展”与“和谐世界”理念,没有因美日对华发动“人权外交”和“价值观外交”攻势而以牙还牙,因而免于重新卷入新的意识形态对抗漩涡之中。然而,美、日等西方国家认为,共产主义价值观

已经死亡,中国不搞意识形态外交是因为坚持共产主义理想的中国不敢面对强大的西方价值。因此,它们的“价值观外交”会变本加厉地继续下去,并将对亚洲其他“民主”国家的对华政策产生传染效应。正如英国有人所言:“印度尼西亚外长如是说:大亚洲民主政治正在构建以价值导向为基础的战略伙伴,因为他们了解和平与民主是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印度总理说他的国家只有生活在一个民主的地区才会安全;日本领导人想要在整个亚洲建立一个自由与繁荣之孤;东南亚领导人宣布,地区的稳定有赖于国内外的民主。这里存在一个与中国领导人的想像千差万别的亚洲世纪。”<sup>2</sup> 这就形成了以意识形态为牵引的外交博弈态势:一方面,美日持续加强反华的“民主人权外交”和“价值观外交”;另一方面,中国为国际关系和谐发展而奉行一种避免意识形态对抗的外交政策。由此,中美日三角框架中博弈关系的不对称更加清晰可见。

冷战时期的中美苏三角关系有一个很明显的特点,那就是美国无法在意识形态方面与其他任何一角形成对另一角的压迫之势。中苏虽然处于对抗状态、在意识形态上存在重大分歧,但是一致坚持马克思主义价值观,中苏之间这种价值观上的一致性反而对美国构成一定压力。因此,美国在处理中美苏三角关系时,完全回避了价值观因素,难以在对中苏关系上打“民主”牌和“自由”牌,而只能从现实主义的立场出发强调非意识形态的战略利益。所以,当时的中国在中苏美三角关系中几乎感受不到“价值观外交”的重压,显得比较主动。如今,中美日三角关系则不同,2007年日本《外交青书》就声称,“美日同盟”的思想基础是“两国共同之价值观”。<sup>3</sup> 日本媒体就此津津乐道:“日本最近决定要发展一个建立在支持普遍价值观基础上的外交政策是一个重要步骤,这表明日本所追求的国家利益思路更加清晰

<sup>1</sup> Barack Obama “Renewing American Leadership,” *Foreign Affairs*, Jul/Aug., 2007, p. 2

<sup>2</sup> “価値観議論—「安倍応援団」の危うさ”, [日]《朝日新闻》, 2007年5月20日。

<sup>3</sup> “The new Asian order's challenge to China” *Financial Times*, Sep. 26, 2007, p. 15

<sup>4</sup> 日本外务省主编:《外交青书》, 2007年,第58页。

和更具有战略性。新政策似乎是为了使之和美国的合作更加顺畅,同时使东京在东南亚得以专心致志努力与中国竞争影响力。”<sup>1</sup> 美国也有舆论指出,“美日同盟近年来已经历悄然转变,它超越特定的‘同盟管理’(alliance management),以建立基于共同价值和战略利益的坚固的合作基础”。<sup>2</sup> 西方国家也有与美日的反华“价值观外交”唱反调者,认为“美日不应该拉拢澳大利亚和印度追求价值同盟,因为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无边际的、不可能撼动中国的反华行为,也无助于改善地区安全”<sup>3</sup>。但是出于意识形态“对抗利益”的需要,美日肯定不会轻易放弃其对华政策的意识形态牌。

第三,东亚多边安全机制向美、日倾斜,使中国在中美日三角关系中处于不利地位。东盟 10+ 3 机制在政治与安全方面严重向美日倾斜,其中的日本和韩国是美国的军事同盟国,朝鲜被排除在机制之外,这是东亚地区主义潜在紧张和不对称发展的深层次原因。如果从对等的原则出发,东盟合作机制应该是 10+ 4 就是在 10+ 3 的基础上增加朝鲜,但是这一“应然”在短期内不会成为必然。而且,为了更进一步削弱中国在东亚政治与安全事务中的影响力,美日加大了掺沙子的力度——把和它们拥有具有共同价值观的澳大利亚(与美国有同盟关系)、印度、新西兰三国拉入东亚安全机制之中。对此,中国似乎处于两难之中,如果接受就会令自己在机制中的孤立地位加剧;如果公开反对就容易使自己与这三国关系受到不利影响。因此,首届东亚峰会召开时,也吸收了地理上不属于东亚的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家参加。日本则把东亚事务看成西方利益的延伸,而不是东亚自己的事情和利益。有外国学者指出,“日本不准备危害其与美国的关系,它不太可能愿意放弃西方取向去建立东亚地区共同体”<sup>4</sup>。在如此严重不对称的前提下,中国要投入外交资源去推动东亚从政治上建立共同体,显然是力不从心和代价巨大的。<sup>5</sup> 更何况,“部分亚洲国家相信,如果美国要脱离东亚,中国对东亚的霸权欲望将出现”<sup>6</sup>。在一些亚洲国家看来,美国的存在不但不是威胁,而且还是“安全感”的来源,而中国反倒成了“潜在的威胁”。东亚的安全合作机制 10+ 3,对

于中国的外交平衡而言,原本就相当不对称,10+ 6 就更是向美日战略利益倾斜。在此条件下以传统方式谋划中美日三角关系,难度系数就更大。

由于存在上述三个方面的不对称性,中美日关系并非通常意义上的三角关系,而只是超级强大的几乎完全重叠的美日一边对相对弱小的中国一边的关系。这种情形有如中国先秦《逸周书》所谓“七恶”中之一恶:“闲于大国,安得吉凶”。<sup>6</sup> 中国面对美日这两个结成同盟的亚太超强国家,如不采取相应的对策,其祸福就可能只好听任美日决定。

### 传统不对称性解决方式的非现实性

在解决中美日三角关系不对称性的传统方式中,有两种常被提及并运用于操作:一是加强中美双边关系,以平衡美日对华关系的不对称性;二是加强中日双边关系,以平衡美日对华关系的不对称性,但它们可能或者已经产生了不良后果。

加强中美关系以平衡美日对华关系的不对称性是不现实的,因而不可能如愿。中美两国目前在各个方面的合作呈现日益深化的趋势,美国在华商业利益超过其在日本商业利益,中国在一系列政治、安全问题如六方会谈和伊朗核问题、全球反恐等问题上都积极配合美国。同时,“小看日本”(Japan-passing)论则在美国占据一定市场。<sup>7</sup> 日本的战略是尽量把中国纳入到美国和日本监控的框架之中,<sup>8</sup> 以使日美关系不至于严重滑坡。美国民主党

<sup>1</sup> David Fouse “Two-edged sword of values” *The Japan Times* March 23, 2007.

<sup>2</sup> Michael Green Nicholas Szechenyi, “Common Values: A New Agenda for U. S. - Japan Relations” *Georgetow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Summer 2006, p. 47.

<sup>3</sup> Morton Abramowitz “The Globe’s Most Important Relationship: Japan and the US can better solve regional and global problems together than alone” *Yale Global*, 8 January 2008.

<sup>4</sup> Yeo Lay Hwee, “Japan, ASEAN,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an East Asian Community,”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Aug. 2006, p. 270.

<sup>5</sup> 郑先武:“‘东亚共同体’愿景的虚幻性析论”,《现代国际关系》,2007年第4期,第60页。

<sup>6</sup> Neil Francis “For an East Asian Union,” *Harvard International Review*, Fall 2006, p. 77.

<sup>7</sup> 见《逸周书·酆保解》第二十一。

<sup>8</sup> David Ranson “Protectionism and the Falling Dollar” *Wall Street Journal* (Eastern edition), Oct 30 2007, p. A. 19.

<sup>9</sup> Takahiko Kajita “Expert urges ‘proactive’ diplomacy with U. S.,” *The Japan Times* March 11, 2008.

总统参选人奥巴马不久前发表文章,其中没有谈论美日同盟关系的重要性,相反却警惕日本的“不买帐(assert themselves)”,其亚洲政策的主要关注点是“鼓励中国作为一个‘正在成长中的大国’,在帮助领导解决 21 世纪的共同问题上发挥负责任的作用”。<sup>1</sup> 日本有学者对此表示担心,认为奥巴马如果当选美国总统真有抛弃日本之意。<sup>2</sup> 《朝日新闻》不无醋意地评论说,奥巴马的“变化”、“梦想”、“希望”完全是抽象概念,毫无价值,在日本的政治家看来是非常陈腐的东西。”已经退出总统大选的民主党人希拉里似乎看到了中美关系的巨大潜力,她曾经表示,如果当选将把美国亚太外交的重点放在中国,而不是日本。<sup>3</sup> 美国驻日本大使因此还专门对日本朝野做安抚工作。日本媒体甚至注意到,“共和党已提名的总统候选人麦凯恩虽然也在美国《外交》杂志上发表文章,表达欢迎日本在国际事务中发挥领导作用,但在大选中麦凯恩几乎没有提到过日本,同样显示出对日本的轻蔑之态”<sup>4</sup>。与此同时,日美关系确实在经济、安全这样的关键领域出现了不确定因素,比如日本自民党在参议院的选举中输给民主党,中断了日本在印度洋配合美军海上反恐的加油使命,一度使日本与美国的安全合作变得困难重重;由于日本市场的长期封闭和狭小,美国与日本的经济关系停滞不前。日本一位前外交官对此形容说,在美国国内亲日派受到打击,亲华派、反日派得势,……历代政府好不容易发展起来的日美信赖关系之根底受到伤害。<sup>5</sup> 日本强烈要求:“必须在朝鲜绑架日本公民事件圆满解决的前提下,美国才能考虑把朝鲜从发动恐怖主义的国家名单中删除”。<sup>6</sup> 而美国对此不予理会。这些都使日本朝野担心,中美接近之时就是美国抛弃日本之日。然而,上述种种表现并不意味着美日关系发生了根本变化。

新中国诞生后,美国一改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与中国建立全方位友好关系的做法,转而扶持曾经是世界人民的共同敌人——战败的日本。美国出于意识形态对抗的需要,加紧重新武装日本,并通过在日建立军事基地和与日建立军事同盟,把日本牢牢地捆绑在美国的战车上,让日本发挥遏制中、苏两个社会主义大国的桥头堡作用。苏联解体后,美日

同盟变成了实际上仅仅针对中国的双边同盟体系。历届美国总统都视美日关系为美国在亚洲的重要关系,都将美日同盟视为美国在东亚地区霸权利益的核心保障。共和党总统候选人麦凯恩最近就发誓,“美日同盟是亚太的和平与繁荣不可替代的支柱”,只有加强它,“才能使崛起的中国以负责任的国家融入到国际社会”<sup>7</sup>。由此看来,无论中国在中美关系中投入多大的资源,无论中国怎样地希望通过加强中美关系来冲淡美日对华关系的严重不平衡性,都似乎难以达到目的。中美的接近确实造成了日本的心理紧张,但是不会从根本上打乱日本的阵脚。因为,美日军事同盟体系不会消失,反而有可能会大大强化。如果中国恢复对台湾行使主权(无论是否以和平方式)的步伐加快,美日同盟的作用就会马上表现出来。美日曾在 2005 年 4 月共同“呼吁”和“鼓励”中国和平解决有关台湾海峡的问题,并将之作为美日共同战略目标。<sup>8</sup> 最近,《日本时报》更是很露骨地表示,“中国进攻台湾的能力面临诸多制约因素,其中之一是受制于美日卷入冲突以保卫台湾岛的可能性,美日把台湾的安全列为其共同的安全关注并由此使美日两国组成了一个强有力且紧密的安全联盟”<sup>9</sup>。对中国来说,维护国家统一关系到最根本的国家利益,而对美日保持密切关系则相对次要许多;如果非要在两者之间做出选择不可,中国只能选择捍卫对台湾的主权、维护国家统一。美日

<sup>1</sup> Barack Obama “Renewing American Leadership”, *Foreign Affairs*, Jul/Aug 2007, p. 2

<sup>2</sup> 田久保忠衛:“米大統領選挙”,《产经新闻》(政论),2008年2月15日。

<sup>3</sup> “米大統領選挙—政治への熱気がまぶしい”,社説,《朝日新闻》社论,2008年2月14日。

<sup>4</sup> Reiji Yoshida “U. S. - China ties won't mar Japan bond”, *Schieffer* “The Japan Times” Oct. 25, 2007

<sup>5</sup> “米大統領選挙 分岐点の選択に注目する”,《世界日报》2008年2月8日。

<sup>6</sup> 日本前驻泰国、岡崎久彦:“新? 安倍内閣発足! ¡ 対策特措法で対応を誤るな”,《产经新闻》2007年8月30日。

<sup>7</sup> “日米首脳会談 気になる過重な‘宿題’”,《东京新闻》2007年11月18日。

<sup>8</sup> “米大統領予備選 ° ¼ 氏指名でやつと決着”,読売社説,2008年6月5日。

<sup>9</sup> Jim Yardley and Keith Bradsher “China Accuses U. S. and Japan of Interfering on Taiwan” *New York Times* Feb 21, 2005 p. A. 3.

<sup>10</sup> Max Hirsch Taipei “China’s Taipei envoy pick said potential Tokyo foil” *The Japan Times* June 11, 2008.

则把维持台湾海峡两岸的分裂局面视为其关键利益,如果非要在维持对中国的关系与台海两岸的永久分裂之间做出选择的话,它们很有可能会选择后者,而牺牲与中国的正常关系。这也就是说,在美日的战略棋盘上,相对于其心照不宣的目标——使海峡两岸永久分裂,维持与中国的关系则次要得多。中国要想与美日发展等边三角关系,唯一可能的选择就是牺牲自己的根本利益,这显然是不能成立的。可以设想,一旦中国把国家完全统一列入具体的日程之中,唯一与美国一起公开阻挡中国的国际势力,无疑会是日本。<sup>1</sup> 因此,无论中国与美日的关系如何加深,只要面对涉及其根本利益的问题,美日马上就会联合起来共同对付中国。<sup>2</sup> 可见,在中美日三角中,无论中美全方位合作发展到何等地步,都不可能改变美国对日结盟关系。

同样道理,想要通过加强中日关系以平衡美日对华关系,也是不现实的。一方面,日本视与美国的同盟关系为其最重要的外交资产,依靠美国、加强日美同盟是日本最重要的外交政策选择,任何在日美同盟关系中引入“干扰变量”的企图都会严重触动日本敏感的神经。尽管日本长期以来和美国维持的是一种美主日从的、不平等的关系,但只要美国不抛弃日本,只要美国继续维持与日同盟关系,哪怕美国玩弄“越顶外交”甚或美国大兵在日本领土上污辱日本少女等有伤日本民众感情的事情不时发生,日本仍会坚信自己能从日美同盟关系中获取政治和安全的“红利”,为日本在东亚称霸和遏制中国的崛起发挥重大作用。”因此,日本绝对不允许它与美国的同盟关系演变为开放的、东亚国家均平等参与的多边安全机制。另一方面,日本并不看好中国积极改善中日关系的期望和努力。日本领导人日益频繁地表示日本与美国的关系具有压倒一切的重要性。<sup>3</sup> 日本退休的著名外交官冈崎久彦就曾露骨地说,“亚洲的未来将由中国和美日同盟的双边平衡来决定,而不是由美、日、中这三个国家之间的三边平衡决定。日本未来的中国政策是什么? 加强美日同盟; 有关北朝鲜日本能做什么? 加强美日同盟”。<sup>4</sup> 他还神经过敏地曲解中国的对日政策,认为“中国对日外交的最大的目标是什么? 是离间美日

关系。因此,日本的外交很明确,就是强化美日同盟。这就是我们的对华政策”。<sup>5</sup> 冈崎一直是日本政府对外政策顾问,他的言论很大程度上能够映射日本政府的真实立场。也就是说,中国如果想搞中美日三角等边平衡关系,那不过是一厢情愿而已。这等于是提醒我们,简单地认为中日关系只要放在两个国家的框架之内就能搞好的想法,是极其天真的。此外,中日关系围绕台湾问题形成了双边困境。战后日本历届政府在对外政策上均以强化日美同盟为核心。正如日本学者所指出的,以日美同盟的稳定为最优、支持美国的方针为基本之战后日本对外政策决策之基轴,从来都未曾动摇过,日本外交虽然标榜“国际协调和对美支持并举,但实际上根本不存在一个国际协调的路线,而是支持和坚持美日同盟”。<sup>6</sup> 因此,中日关系改善得再好,也不可能改变日美关系在日本对外政策中的重要地位。

## 中美日三角关系不对称性的应对之策

在国内国际关系学界,对中美日三角关系存在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两种情感。其中,乐观主义甚于悲观主义,前者认为中美日关系“正在朝三角关系的方向演变”,<sup>7</sup> 中美日三边合作的发展是历史的必然,<sup>8</sup> 甚至认为“三国之间不再构成直接的军事威胁和武装对峙,而是处于相互依存与矛盾—协调与制约—合作与竞争—对抗与对话的多种样态并存的结构框架之中”<sup>9</sup>。悲观论者少见,即使可见也带有

<sup>1</sup> Geralt L. Curtis, *The Logic of Japanese Polit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9, p. 13.

<sup>2</sup> Lan Peng-er, “Japan-Taiwan Relations: Between Affinity and Reality,” *Asian Affairs*, Winter 2004, p. 249.

<sup>3</sup> 曹筱阳:“美日同盟:面向 21 世纪的全面调整”,《当代亚太》,2006 年第 9 期,第 35-37 页。

<sup>4</sup> James Brooke, “The Dragon for Trade, the Eagle for Safety,” *New York Times* (Late Edition (East Coast)), Feb. 6, 2005, p. 8.

<sup>5</sup> James Brooke, “The Dragon for Trade, the Eagle for Safety,” *New York Times* (Late Edition (East Coast)), Feb. 6, 2005, p. 8.

<sup>6</sup> David Pilling, “Tanigaki urges Japan improve China relations,” *FT.com site*, Aug. 23, 2006.

<sup>7</sup> [日] 桜田大造, 伊藤刚:《比較外交政策— 日 戦争への対応外交》, 明石書店 (2004/12), 第 59 页。

<sup>8</sup> 贾庆国:“中美日三国关系:对亚洲安全合作的影响”,《国际政治研究》,2000 年第 2 期,第 33 页。

<sup>9</sup> 杨伯江:“从总体趋势中把握中美日三边关系”,《现代国际关系》,2002 年第 3 期,第 20 页。

<sup>10</sup> 林晓光:“中日关系与中美日三角关系的利益结构分析”,《和平与发展》,2004 年第 4 期,第 18 页。

乐观的期待, 比如有学者认为, “出于权力、威胁、利益关系因素的考虑, 美日同盟会继续防范中国, 日本将走在美日同盟的前沿, 推行较美国更为强硬的对华政策。与此同时, 日本的对华政策将会受到美国的牵制。最近的将来, 中日关系不容乐观, 很难好于中美关系, 但由于美国对日本的牵制, 中日关系也不至于走向完全恶化”<sup>1</sup>。

乐观论者的基本假设是, 中美日三角关系“有解”, 有办法应对之。其实, 国际关系的很多问题, 尤其是重大的国际问题, 要想找到一劳永逸的解决办法是不可能和不现实的。如此认识问题, 是不是就意味本文对中美日三角关系持悲观的立场? 不是的。本文的立场大概介于“乐观”与“悲观”之间。这样一种中间状态不是随心所欲的。理由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 三角外交实践很少能够成功。美国在尼克松时期与中苏成功地开展了三角外交, 但是这一三角关系随着冷战的结束也告终结。据美国解密档案显示, 尼克松时代还企图用三角外交将 1971 年印巴战争转变为中苏对抗, 但以失败而告终, 因为尼克松及其助手简单地认为巴基斯坦是中国的代理, 印度是苏联的代理, 只要美国站在巴基斯坦一边, 就等于美国和中国站在一边, 这样, 中苏两大国必然互斗。<sup>2</sup> 但是, 结果并没有出现美国所期望的局面。这至少说明, 三角外交并非普遍有效的外交模式。第二, 任何事物都是变化、发展的, 中美日三角关系的不平衡总有一天会趋向平衡, 只是其发展过程将是漫长的。只要中国坚持致力于建构开放的东亚安全机制, 不断“输入能量”(比如中国在“六方会谈”中所发挥的主导作用), 中美日三角关系就会朝着相对均衡的方向发展。第三, 中国的国际地位决定中国必须“守中”。中国虽然是发展中国家, 但也是一个政治、经济、文化等硬实力和软实力不断增强的社会主义大国, 中国的发展打破了西方有些人所谓“中国崩溃”的预言”。同样, 中国的发展并不会得到美日的欣然接受, 相反, 正是因为中国不可阻挡的崛起, 让美日等国不少人视中国为威胁, 进而促使其政府从政治、军事上加强对中国的遏制。中国永远不称霸, 也永远不会和超级大国争霸, 而是坚定地走和平发展的道路, 同时努力构筑强大的物质

和精神堡垒准备应对一切霸权主义者对中国的侵略或干涉, 并与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发展全方位的关系。第四, 国际形势的发展趋势要求中国“守中”。整个世界政治的基本态势是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问题交织, 而非传统安全问题日益突出, 传统安全问题则相对稳定。也就是说, 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矛盾在某种意义上已经让位于合作, 以共同应对恐怖主义等非传统安全问题。在未来的中美日三角关系中, 在应对非传统安全问题时加强合作成为三国关系的重中之重。

客观地说, 面对中美日三角关系的不对称性, 既不可乐观也不必悲观, 完全可以坦然相对, 无所谓憎恨, 也无所谓善意的期待, 而是应该在保持适度的危机意识和防范意识的前提之下, 学会适应, 必要时再寻求办法加以应对。这大概可以称之为“无为”或顺其自然的方式。惟有如此, 我们才会做出理性、冷静的思考和科学的分析, 进而推行适宜的对策, 从而达到“无不为”的境界。正如《纽约时报》所理解的那样, “老子的‘无为’, 从字面上看, 可以被理解为‘不作为’, 但其真正的意思是不以强制的方式采取行动”<sup>3</sup>。换言之, 中美日三角关系能否向积极方向发展, 关键并不取决于愿望, 乐观精神和悲观态度都无济于事, 而是取决于三国实力对比的消长、外交决策的科学性与策略的灵活性。○

(责任编辑: 黄昭宇)

<sup>1</sup> 韩召颖、杨银厂: “美日同盟对中国防范的加强与中日关系走向”, 《国际论坛》, 2007年 3期, 第 36页。

<sup>2</sup>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69 - 1976: South Asia Crisis 1971, Volume XI, Washington DC: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2005.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69 - 1976: South Asia Crisis 1971, Volume E - 7, Washington DC: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2005.

<sup>3</sup> See Gilbert Taylor, “The Coming Collapse of China” *The Booklist*, Jun 1/ Jun 15, 2001, p 19. Gordon G. Chang “Halfway to China’s Collapse”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Jun 2006, p 26. Dan Johnson “Will China collapse?” *The Futurist*, Jan/ Feb 2002, p 10.

<sup>4</sup> “W hat T’ ai Chi is Dong For Dang” *New York Times* Sep 21, 1980 p. A. 8.